

给形式主义加班“刹一刹车”

治理“新官不理旧账”关键在“算账”

□ 王石川

近日，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程红建议，禁止政府换届、职能调整等为由违约毁约，“对于确因公共利益而需调整的，应当对经营主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维护政府公信力”。

此前，最高法、最高检曾多次表示，坚决纠正“新官不理旧账”，开展失信违约等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历经多年治理，我国在政府诚信建设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效。但是，“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仍未绝迹。今年又有政协委员提出“禁止‘新官不理旧账’”，说明治理这一顽疾，既要精准发力，更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新官不理旧账”既悖情理，也违法违规。签订了合同却不执行，或不执行到底，因换了领导就戛然而止，明显于法无据，也背弃了政府的责任。对此，人们不得不要问：“新官不理旧账”为何一难难以根除？究其原因，一些新官视“旧账”为包袱，为“烫手山芋”，怕担风险；新官上任，急于烧新火、立新功，便另起炉灶，而不愿理旧账。此外，还有一些新官认为，花心思、耗精力，把旧账理得再好，也是前任之功。与其为他人“做嫁衣”，何不裁新衣、立新功？

这些观念和想法，无疑都是极端短视且错误的。高质量发展是一场接力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应是底线要求。如果“合同刚签了，领导换人了，投资到位了，又说不干了”，不仅伤害投资人的合法利益，还直接破坏当地的营商环境。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一旦失信于人，不仅会吓跑眼前的投资者，还会给之后的招商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治理“新官不理旧账”，可着眼于“算账”。算账，先算损失账。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程红提到的，对于确因公共利益而需调整的，应当对经营主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维护政府公信力。如果非因公共利益而赖账，造成了损失，更该加倍赔偿。最高法曾表示，行政审判始终坚持既依法也依约，既调解也判决，坚决纠正“新官不理旧账”，坚决监督行政机关守钱践诺，较好发挥了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依法裁决，严肃处理，给受害者提供法治支撑，让失信的政府部门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有震慑效应。比如，给市场主体造成损失的，应当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

算完损失账，再算问责账。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增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影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新官不理旧账”触发了党纪，是要被问责的。该问责就果断问责，该处理时绝不延宕，也有助于倒逼新官主动担当责任，理清旧账。

对各级官员而言，要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敬畏规则，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新官理旧账、算账有担当，让政府公信力坚如磐石，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才是最高明的“算账”。

□ 夏熊飞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报道，近日，北京市教委出台《北京市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2025—2027年）》。其中明确：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中小学将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学校可以将人工智能课程独立设置，也可以与信息科技（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劳动等课程融合开展。

当下，“AI+”正赋予事物更多可能，校园教育同样深受AI技术、产品的深刻影响。北京新出台的工作方案，传递出“AI教育从小学抓起”的鲜明信号：在课程设置上讲究因材施教，小学阶段以体验式课程为主，初中阶段以认知类课程为主，高中阶

□ 林铭汝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姚基金创始人姚明提出“动员未成年人开展息屏24小时”的行动建议——在每个学期选定一天，所有人在24小时内都不使用手机。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主持的《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及相关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在16834份有效问卷中，78.2%的人群希望自己减少使用带屏幕电子产品的时间；83.7%的教师群体赞同学生减少带屏幕电子产品的使用；96.4%的家长担心孩子过度使用带屏幕电子产品。

这些数据体现了人们对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担忧。当前，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多是由于学习、娱乐与社交的需要，但其中电子依赖、网络成瘾等现象不容小觑。此前就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具体包括导致视力问

□ 杨鑫宇

最近，某知名企业“强制员工9点前下班”的话题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据该公司一名员工介绍：有主管在部门组会上提出，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不提倡过度加班，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就早点下班回家，“必须9点下班”。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知名企业“强制18点20分下班”的消息，也在网上引发热议。

在网络上，不少人对这些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此类措施能给过度加班、竞赛加班等不良现象“刹一刹车”。



破除 35 岁门槛

□ 盘和林

2023年6月，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公开场合提到“好房子”的概念，此后，社会各界对此多有讨论。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就在今年2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率先发布《北京市平原多点地区“好房子”规划管理相关技术要点（试行）》，对“好房子”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标准。

有关部门为何如此重视打造“好房子”？其一，老百姓对房子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是解决房子“有没有”的问题，而如今楼市供需逆转，只有“好房子”才会有市场。其二，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当前住宅楼诞生了很多新需求，例如普及新材料的需求，推广智能家居的需求。其三，部分旧标准不再适合，比如2011版《住宅设计规范》中提到“住宅层高宜为2.8米”，实际上限制了住宅层高。

培养人工智能素养 让青少年做技术的主人

段则以综合性与实践性课程为主——层层递进的逻辑既符合基本教育常识，也有助于学生循序渐近掌握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整个工作方案颇具前瞻性，或将助力当地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在AI技术突飞猛进与迅速普及的时代，校园不可能与人工智能保持绝缘成为“世外桃源”，主动实现AI教育的融合是必然选择。AI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拓展教学方式，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都是强有力的赋能增效。

AI技术的进步发展，离不开学校培养输送的高水平人才。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只有从小在孩子心中播下AI技

术的种子，未来才可能孕育出更多高精尖的领军人物。

此，我们应对未成年人的电子产品使用方式加以引导与规范，追求虚拟与现实平衡，而非“一刀切”地对其予以屏蔽。

息屏之后如何填补时间的空白，让未成年人找到更有吸引力的活动，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此，姚明鼓励青少年走向运动场，贴近大自然，走进真正的社交场景。此外，阅读、书画、音乐等兴趣活动也能让青少年去探索更加精彩的生活。在与电子屏幕隔绝的同时，还应避免让“息屏日”成为“补课日”“作业日”，让青少年真正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乐趣。

其实，“息屏日”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举措。引导青少年健康使用电子产品，才是这一提议的真正目的。要想实现这一目的，

应该看到，在部分行业、部分领域，超时加班已经见怪不怪，形成了某种“潜规则”。多家企业就“强制下班”出台内部规定，回应了劳动者积累已久的“痛点”，表明了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态度。当然，其实施过程中的效果仍有待继续观察。

需要明确的是，在部分行业，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完成重大项目、重要创新，企业确实需要员工加班。在一定条件下，不少员工乐意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来完成任务、扩大团队成果，这是劳动者奋斗精神的体现。公众反对的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无效加班、形式主义加班，以及漠



“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对此，参会代表委员高度关注，尤其对“35岁就业门槛”现象提出见解和建议。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表示，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就业还设置年龄门槛已然不妥。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认为，35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岁数，正是干事的时候，不应以此年龄为工作设限。《人民日报》3月12日）

漫画：徐 简

用“好房子”安放居民美好生活

切实推进“好房子”的建设工作，首先要重新制定标准，修改不合理标准，明确“好房子”要达到怎样的建设水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倪虹部长表示，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在组织编制“好房子”的建设指南，也在修订《住宅项目规范》，新标准将多个维度改善住宅体统，比如通过改善住宅的高度、温度、湿度、净度、亮度、采光度等方面的住房建设标准，提高中国住宅楼的质量标准。其中，“层高标准将调整为不低于3米”，可以让住宅设计更加灵活、更好地满足居住者的需求。

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离不开科技的加持。对此，在推广普及新材料、智能家居时，需要对技术的成熟度和可信度进行充分的、科学的论证。力求在经济性、实用性、舒适性、生态保护等方面实现多点兼顾。围绕“好房子”，经营主体亦可以积极尝试新产品、新服务、新生态，比如在智能家居方面，单纯的语音识别是智能，内嵌大语言模型的是也是智能，不同的智能能够收获不同的体验。在我国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当下，“好房子”也可以乘上这波东

风，为居住者提供更优质的体验。

建设“好房子”，还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海边的住宅容易遭遇高温、高盐 and 强风，比如地震带的住宅需要更高的抗震等级，比如平原地区的住宅和山区的住宅标准应该有所不同。未来的标准制定，必须根据不同的住房场景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且考虑好各种特殊情况，如此方能有效提高住宅楼的安全性、生态性和耐久性。

未来几年，“好房子”建设将成为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的重要赛道，围绕好房子建设的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智能家居和新建设需求等产业领域，都有望获得较快的增长。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有关部门已经清晰认识到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变化，更加注重买方的居住体验，这也有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转型升级。希望相关企业尽早适应这个新环境，一方面要提高认知，跟上政策节奏，吃到这波红利；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标准讨论，让“好房子”建设实实在在提高住宅楼的质量，安放居民的美好生活。



“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对此，参会代表委员高度关注，尤其对“35岁就业门槛”现象提出见解和建议。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表示，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就业还设置年龄门槛已然不妥。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认为，35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岁数，正是干事的时候，不应以此年龄为工作设限。《人民日报》3月12日）

漫画：徐 简

给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尊严

□ 杨警仪

保洁阿姨能有独立的休息室吗？身在大学，我不时会想到这个问题。

在校园里，我们常常看到，负责教学楼清洁工作的保洁阿姨们，在工作之余，只能坐在厕所隔间、靠在走廊，或者趴在空闲教室的课桌上短暂休息。由于存放私人物品的空间有限，阿姨们不得不将衣物、水杯乃至饭盒和清洁工具混放在一起。记得军训结束时，一位保洁阿姨向我要了军训时用的小马扎，说它便于携带，上班有空闲的时候可以支起来坐一会儿。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学校存在，在城市的很多地方也屡见不鲜，阿姨们没有独立的休息区域，只能随意找什么地方靠着，或是直接躺在地上，以放松自己疲惫的双腿。

劳动者权益保护需要突破惯性，制定规则时应顾及那些被忽视的具体诉求。近日，“我呼吁能够给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的思考，讨论休息室应提供的设施，如储物柜、折叠床、微波炉等，并强调“这不是福利，而是基本权利”。

许多保洁人员属于外包公司雇员，处于劳动关系边缘，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常常忽视休息空间的配置，将劳动者的权益让位于工作效率。同时，在规划上，各种公共场所往往优先将空间用于建筑的主要功能，像保洁阿姨这种支持性劳动者的基本需求，便只能被“压缩”到角落里，以工具间、厕所隔间为“替代方案”。社会还需想办法，回应其被忽视的劳动权益。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取得相关进展。北京市东城区启动了“暖心驿站”，依托垃圾楼、公共厕所等建筑为环卫工人建设驿站空间，里面配备有桌

管理者还振振有词，要么表示“工作量是固定的，干不完加班是自己的事”，要么强调“工资已经很高了，多加班也是应该的”。以加班而不是按时下班为常态，模糊了企业规范管理与灵活竞争的界限。

这些信奉“加班主义”的企业，只看到延长员工工作时间增加产能的虚假表象，却忽视创新的氛围、高效的管理才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如果团队没有凝聚力、缺乏创新精神，再长的工作时间，也只能让人感到虚耗。相反，一些成功的企业尽管也有加班，但其真正的优势绝不是依赖剥夺员工休息时间。不能只看到深夜的灯火通明，而忽视企业对创新精神的呵护、

对员工权益的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内卷式”竞争不仅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也涵盖企业内部因不当管理产生的内耗。对用人单位而言，唯有将加班全面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让员工得到公正、合理、符合劳动法规的对待，才能解决核心矛盾，对无效加班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拿出更有效的激励措施，警惕无效“内卷”，才能使企业和员工在加班问题上达成一致，实现各取所需的“双赢”，而这也是打造健康职场生态的关键所在。

给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尊严

□ 杨警仪

保洁阿姨能有独立的休息室吗？身在大学，我不时会想到这个问题。

在校园里，我们常常看到，负责教学楼清洁工作的保洁阿姨们，在工作之余，只能坐在厕所隔间、靠在走廊，或者趴在空闲教室的课桌上短暂休息。由于存放私人物品的空间有限，阿姨们不得不将衣物、水杯乃至饭盒和清洁工具混放在一起。记得军训结束时，一位保洁阿姨向我要了军训时用的小马扎，说它便于携带，上班有空闲的时候可以支起来坐一会儿。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学校存在，在城市的很多地方也屡见不鲜，阿姨们没有独立的休息区域，只能随意找什么地方靠着，或是直接躺在地上，以放松自己疲惫的双腿。

劳动者权益保护需要突破惯性，制定规则时应顾及那些被忽视的具体诉求。近日，“我呼吁能够给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的思考，讨论休息室应提供的设施，如储物柜、折叠床、微波炉等，并强调“这不是福利，而是基本权利”。

许多保洁人员属于外包公司雇员，处于劳动关系边缘，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常常忽视休息空间的配置，将劳动者的权益让位于工作效率。同时，在规划上，各种公共场所往往优先将空间用于建筑的主要功能，像保洁阿姨这种支持性劳动者的基本需求，便只能被“压缩”到角落里，以工具间、厕所隔间为“替代方案”。社会还需想办法，回应其被忽视的劳动权益。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取得相关进展。北京市东城区启动了“暖心驿站”，依托垃圾楼、公共厕所等建筑为环卫工人建设驿站空间，里面配备有桌

椅，供工人们吃饭和简单休息；上海市总工会将“建设改善1000间生产一线职工间休息室”纳入2024年服务职工实事项目。还有多个城市开展劳动者休息室、歇脚点等的建设，并不断听取民众建议、关切一线劳动者的需求，丰富、完善配套措施，为劳动者提供工作之余的“小憩之地”。

“我呼吁能够给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探讨下，方案落地的可行性仍需考量。一整栋大楼可能只有少数保洁人员，而清洁工具大部分都放置在工作区域，也很难实现24小时热水、带锁储物柜、折叠床、医药箱、微波炉等必要配置。在过渡期，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保洁人员提供与清洁工具分离的、更卫生的、条件更好的休息空间，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更新和升级，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家张小满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中这样写道：“上午9点，当写字楼的白领们来到工位，开启一天的工作，保洁员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接下来，他们要保证的便是不不要被‘投诉’，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来回走动，不断擦拭，处理‘污染’现场。”保洁人员的工作间隙和休息时间很短，在某些情况下，若离开岗位去休息点还容易被罚款，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在岗位上就地休息。

妥善解决保洁阿姨休息室的问题，除了提供物理空间的支持和建设，还需要建立合理的休息机制和工作安排，切实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

休息室不仅是一间房子，也是度量劳动者尊严的一把标尺。那些默默付出、维护公共场所环境的劳动者，都对更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有所憧憬。希望包括保洁人员在内，所有劳动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合理的权益都能够得到更多保障。

□ 陈 朋

近期，《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填写、核实、报送各类表格消耗了基层干部不少时间和精力。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大量时间花在各种报表里，有的甚至戏称自己为“表哥”“表姐”。

近年来，各地持续深化减负工作，让广大基层干部放开手脚、轻装前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办实事。一系列数据表明，随着减负工作的持续推动，一些地方的工作更重实效了，治理效能提高了。不可否认的是，重复填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仍然困扰着基层。

从治理的角度看，填报各种表格是相关部门了解基层状况、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一方面，通过报表，上级部门可以掌握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进而为制定、调整、优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基层也可以通过报表来呈现各行各业生产生活的“原初状态”和原始数据，还可以“借表”反映自身诉求。由此可见，不能忽视表格填报工作的重要性。但填表、报表仅仅是基层治理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并不是目的。因此，不能将填表与基层治理本末倒置。不能忽视填报对基层治理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要从多方面寻求技术支撑和有利条件，让基层填表报表更轻松，进而有力推动基层减负。

对此，一些地方作出了积极探索。比如，重庆市永川区启动“一表通”智能报表改革，应用大数据技术开发相关软件，归集市、区、街道（乡镇）数据300多万条，形成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和自动生成本、比对等功能。同时，规范报表工作流程，除必要文件外，所有报表统一在“一表通”软件里发、填、审、报。湖南省浏阳市启动“一表报”“通”平台试点，推动“一次填报，多方共用”。这些地方的实践探索说明，寻求数据技术突破既是基层减负

的内在要求，也是大有可为之举。

客观而言，运用包括人工智能等工具在内的技术手段推动基层减负并非是一个新话题。很多地方已经做出了诸多探索并取得成效。当前亟须突破的深层次问题是要尽快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共享，防止多头填表、重复填表。比如，以设区市为单位，整合部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同时，建立资源统筹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联动，实现“一次填报，多方共用”，真正达到信息共享、设施共用、服务共建的目的。特别是要优化资源配置流程，通过建立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资源的动态调配和优化配置，避免数据资源闲置和浪费。

沉疴、陈旧的数据库是基层治理中的“鸡肋”，也是一些地方反复填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整合数据资源的同时，还要对数据进行及时更新。重庆市永川区开展的“一表通”系统值得点赞。它设置了更新提醒、辅助填报等功能，实现了首次录入、动态更新、多方复用等多项目标。这说明，在开发数据系统之初，就应该以动态思维对待数据，同步设置“及时更新”的功能。让各类数据始终处于“进行时”的状态，而不能停留在“过去时”。

现实中，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收集了大量数据。但是，由于不懂技术、数据处理方式传统滞后等原因，每当需要统计数据时，还得进行人工统计、报送。这说明，数据资源整合了，也及时更新了，还得有懂数据使用的人。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配备专门进行数据整理的人显然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对基层长期负责数据报送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让其熟练掌握数据生成、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还可以尝试探索以相近区域合作购买数据使用服务。这样，既减少了成本和重复劳动，也提高了效率。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